

建重之序秩會社

行印社版出啓光

SS. LEO XIII "Rerum Novarum"
SS. PIUS XI "Quadragesimo Anno"

板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初版

社會秩序之重建

全一冊定價五元

翻譯者 戴 明 我

發行者 光 啓 出版 社

重慶中三路天壇新村三號

印刷者 南 方 印 書 館

重慶海棠溪敦厚下段

總經理 自 生 書 店

重慶中央公園西大街

引言

記得邱吉爾有一次訪問墨斯科，和史達林談起梵蒂岡教宗在國際生活中地位的重要，史達林冷冷地反問邱吉爾道：「他（教宗）擁有多少師團？」這真十足表現了唯物主義者的觀點。的確，如果要以擁有師團的質量來衡量蟄居在梵蒂岡的教宗，那他實在是無足輕輕的。然而教宗在國際生活中地位的重要，卻並不在這里。除了若干衛隊以外——事實上，這些瑞士衛隊也無非等於一種儀仗隊而已，教宗並沒擁有一兵一卒；可是他所代表的却是國際生活中的一股主力。全世界各處，包括蘇聯在內，都有人在朝着聖伯多祿聖殿遙望，都希望聖伯多祿的繼承者能夠指示他們的迷津。特別是在舉世昏亂的時候，今日如像過去的「黑暗時代」一樣，從梵蒂岡發出來的光芒，照明了各處的人心。這種力量，豈能以擁有師團的數量來衡量的呢？

梵蒂岡，不如說居住在梵蒂岡的宗徒繼承者，是「真理的貯藏庫」。沒有一種武力能夠像精神武力那樣持久，而梵蒂岡却是動員這種精神武力的司令臺。它是道德的最高權威。因為這種職責，所以聖伯多祿的繼承者不時顯露警告，指示散居在世界各處的公教信衆。這就是所謂「教宗通諭」（Papal Encyclical）它們所包含的題目很廣，從有關神修的課題以至婚姻及教育。它們的目的，無非在以教宗的權威地位，對若干問題

，表示了聖教會的態度，使信衆有所遵循。

自從產業革命以來，世界各處受了新興工業發展的影響，社會生活起了劇烈的變動。多數人淪爲赤貧的無產者，而少數人財富的積聚却愈演愈烈，形成了一種在實質上以強迫勞動爲基礎的奴役社會。挽救這種逆流，社會改革家及煽動家提供了各種方案；而這些方案多與基督教的傳統未能符合。教宗良十三世看到這種混亂，「最後，「被宗座的職務所催迫，」鑒於若再守沈默，他就會被視爲放棄責任，他便以自己所擔當的聖職的名義，向全世界的聖教會，不，應該說是向全人類發表了他的宣言。」這就是著名的「教宗良十三世有關勞工問題的通諭：『新事』（*Rerum Novarum*）——『社會秩序的大憲章』」。這通諭發布於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五日。四十年後，即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五日，教宗庇護十一世爲紀念頒發這「社會秩序的大憲章」之四十年，同時爲闡述教宗良十三世的，即聖教會的，理論，又頒發了一道題名爲「四十年」（*Quadragesimo Anno*）的通諭，對社會秩序之重建，提供了聖教會的更詳盡而具體的方案。

由於這兩道歷史文獻的頒布，奠定了聖教會對處理若干社會經濟問題的基本原則，建立了公教社會經濟的完整體系。它的特徵可以中正和平四字概括言之。中是它的不採取絕端主義，一方面既排斥社會主義，特別是共產主義，它方面又排棄了自由主義——這就是所謂資本主義的骨幹。用另一句話來說，公教社會經濟體系，一方面既擴集體

主義，它方面又排斥個人主義。這兩者都是絕端。正是它的整個體系是以社會正義爲基礎，一方面既維護勞動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不主張破壞或剝奪資本家的合法利益。和是它的主張社會各階層間應有和諧，以協調來代替鬥爭。在「社會秩序之重建」這一通諭內，教宗庇護十一世很明晰地說：「我們可以說這乃是國家和一切善良公民的首要責任，要消滅各個有不同利害關係的階級間的衝突，要推進社會各階層間的和諧。」平是它的整個體系以社會正義爲基礎，故社會各階層的合法利益都能得到平衡的維護。

然而在中正和平之上，整個公教社會經濟的完整體系，却發源於一個字，就是所謂「愛」——所謂「仁愛」。這是因爲發源於「仁愛」，所以聖教會對「階級鬥爭」「階級專政」諸謬說，一再申斥，不遺餘力。這些謬說的出發點是嫉恨，與公教觀念之以仁愛爲基礎者，自然根本不相容。因爲它的出發點是仁愛，所以它對於社會各階層的利益纔能無所偏袒，顧到全民福利。

現在距教宗良十三世頒發「社會秩序大憲章」的時日，已五十多年了，就是距教宗庇護十一世的歷史文獻的頒發，也已經有十多年了；而人類却正遭逢着亙古未有的浩劫。在破壞了的廢墟上，無疑地，將有一種新的社會秩序之建立。人類在飽經了創傷以後，應該有一種新的覺醒。因此，在這個時候，將聖教會——即基督教——對於重建社會秩序所提供的方案，予以刊行，也就不完全是一宗無益的事。

教宗良十三世的關於勞工問題的通諭，於一九二七年由陳之藩司鐸譯成華文，交由北平公教教育聯合會刊行。教宗庇護十一世的「四十年」通諭，係由今南京教區宗座代牧于斌主教譯成華文，亦由該會出版。這兩種譯文，在外間可能見到的機會很少。戴明我先生有鑒於此，依據拉丁原文，陳于兩譯本，又加上梵蒂岡教廷所審定的英譯本，重新譯成華文——這就是本集所收的譯文，譯成後，復經方豪司鐸校訂，所以在翻譯上，可以說是相當謹慎的。若能因這本集子的刊行，而使國人對聖教會——公教——有一種新的認識，那就不虛戴方兩君的努力了。

公元一九四四年五月

杭縣葉秋原時客渝州

目次

社會秩序之重建·····	一
勞工問題·····	七三

社會秩序之重建

教宗庇護十一世「四十年」通諭

致我們可敬的神昆：宗主教、首主教、總主教、主教、各處與宗座親睦結合的司牧，及全世界的公教信衆，論依照福音原則重建並改善社會秩序事，紀念前教宗良十三世『新事』通諭頒發的第四十週年。

教宗庇護十一世問可敬的神昆們和可愛的神子們安好，並錫以宗徒遐福

先教宗良十三世頒發了無與倫比的關於勞工問題的通諭：『新事』，到如今已四十年了。全世界的公教教友都懷着感謝的心情追憶這件事，都準備用相稱的隆重典禮來紀念它。

不錯，在這善牧情深的重要文件之前，我們的前任也曾用旁的宣言來給它開了路。他發表了許多公開信論及『人類社會之基礎：家庭、婚姻、配聖事』，論及『政權之起源』，論及『政權對教會之正當關係』，論及『公教公民之信仰與責任』，論及『社會主義之謬妄』，論及『錯誤的人類自由觀念』，這些公開信和其它類似的文件，無疑都表現了良十三世的思想。可是，『新事』卻另有它的特色，它替全人類規定了一些決不會錯誤的原則，使人類團結的困難問題，即一般人所謂社會問題，獲得正當的解決，而其發

表的時候，又恰當這種指導原理最感需要之際。

時機

十九世紀末葉，差不多在所有的文明國家中都出現了新的經濟方法和新的工業發展，而且進展頗速，因此人類社會一天天更顯得分成兩個階級。第一個階級，人數雖少，實際上卻能豐盛的享受近代發明所供給的一切安樂。第二個階級包含勞苦大眾，組成這一階級的人都被可怕的貧困所摧壓，雖竭力掙扎，仍不能擺脫束縛着他們的桎梏。

有錢人對這種事態是可以滿意的，他們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經濟法則之結果，因此，他們覺得欲救濟不幸的貧民，唯一的手段就祇有慈善事業，欲補償這種公開的不公道情形，亦祇有倚仗慈善事業。這種不公道情形，不僅為人容忍，有時卻竟由立法者來認可。在另一方面，工人階級則做了這些不幸事態的犧牲者，萬分勉強的忍受着，一天天變得更加不願意擔荷這副困人的枷鎖了。其中有一些人就被惡意的煽動所迷惑，竟至企圖破壞整個社會組織。另有一些人雖有堅強的天主教的訓誨來約束着，不致誤入極端的迷途，卻也覺得這情形有許多方面都需要作澈底而迅速的改革。

有許多公教教士和教友，也都抱着這種見解，他們懷着可敬的慈悲心腸，傾全力去救濟勞動階級之不當受的貧困，他們決不相信，人間財富分配上的這麼一種鉅大而不公平的差別，會是合乎全知的造物主之本意的。

因此，他們以最大的誠意，在替社會中已存在的這種可悲狀態找尋補救辦法，並且未雨綢繆，企圖防止更壞的危險到來。但是，即連這些動機最純正的人們也自有其弱點，他們不是被人當作危險的急進分子來排斥，便是被從事同一運動而抱有不同見解的工友們所反對，結果弄得徬徨無歸，自己也不知道在這樣的情況下應該走那一條路。

這種見解上的嚴重衝突，時常伴同着不很和平的論爭。因此，就像過去一樣，所有的眼睛便都轉向到伯多祿所傳下來的宗座，因為這是一切真理的貯藏庫，所有的福音都是從這裏散播給全世界的。在基督世上代表的足下，我們看到已聚集着人數多到空前的社會學學者，僱主，以及勞動者本身，他們異口同聲的請求希望最後能給他們指示一條安穩的道路。我們那位持重的教宗早就在天主面前考慮着這件事，並在徵詢最有經驗的參議們的意見，仔細衡量兩方面的理由，最後，「被宗座的職務所催促」，鑒於若再守沉默，他就會被視為放棄責任，他便以自己所擔當的聖職的名義向全世界的聖教會，不，應說是向全人類，發表了他的宣言。因此，一八九一年五月十五日，那久被期待的通諭出世了。不為工作的困難或高齡的壓力所挫折，我們那位可敬的教宗以不屈不撓的勇氣，向全人類指示了解決社會問題的新方法。

你們知道，可敬的神昆們和可愛的神子們，你們很清楚的知道，那使「新事」通諭成為萬古不朽的教義究竟是些什麼。在這個文件中我們那位最高司牧悲悼着人類中如此

大多數所不應受而受的困苦和不幸，勇敢的代表着屈服的孤立無援的工人們的利益，以對抗僱主們的殘酷，和貪得無厭的競爭。他既不求助於自由主義，亦不求助於社會主義。前者早已顯得毫無能力替這個社會問題尋求正當解決，而後者所提供的補救辦法，卻比它所企圖醫治的罪惡更為可怕，其勢非將人類社會拖入更大的危機不可。我們的教宗實行使他當然的職權，便把這問題提出，他深切的意識到自己是宗教的第一個保衛人，是一切與宗教有密切關聯的事物之第一個處理者，並且眼前這問題，若不由宗教和聖教會來干涉，又是無法解決的。他們的理論根據，乃是從正常理性和神聖啓示得來的不可改變的原則；他堅決的並權威的指示着又宣布着，富人和窮人之間，資本和勞動之間，究竟有些什麼相對權利與相互義務，而同時又說明了教會、國家、以及一切有直接關係的人們所應盡的責任。

教宗的呼聲果然未曾落空。不僅是教會的忠實兒女們，即連許多已經遠離了真理，遠離了統一的信仰的人們，也都懷着真正的敬仰心理來聽他的話，並以深切的同情來歡迎他的話。不僅如此，差不多所有的人都重視這個文件，他們或以私人研究者的資格，或以立法家的資格，從此以後都注意起社會經濟問題來了。信奉聖教的工人是更熱烈歡迎教宗這個通諭，他們感覺到世界上的最高權威者在保衛他們；還有那些熱誠於改善勞工生活，但至今一無成就，祇遭逢到大眾的冷淡（且不說非友誼的懷疑，或甚至公開的

難恨）的人們，也非常歡迎它。所有這些人都極重視這分通諭，在世界各地，都一年一度的用種種方法來紀念它，以示感謝之忱。

可是，大眾雖然表示同意，有少數人卻未免惶惑，結果，就有一些人，甚至有公教教友在內，對於良十三世那種在世聽來是十分新奇的，但是極高超的教訓，用一種懷疑的眼光來看，因而對旁人亦造成了不良影響。這分通諭那麼勇敢的攻擊着並推翻了自由主義的偶像，掃除了牢不可破的偏見，它是如此遠又如此出人意外的走在時代前面，因此心靈遲鈍的人便來譏笑着其中對新社會哲學的研究，而膽怯的人則又不敢去測探它那驚人的高度。此外又另有些人，一方面雖對這光輝的文件表示景仰，但仍把它視為烏託邦的理想，覺得雖應該如此，但在實際上可辦不到。

本通諭的範圍

現在適當「新事」通諭的第四十周年紀念，全世界各國都在舉行隆重的紀念典禮，特別是在這個聖城之中，現已聚集着從各方面來的信奉公教的勞動者，所以，可敬的神昆們和可愛的神子們，我們覺得正應該趁這機會說幾句話：第一、我們要追念這分通諭究竟替公教會以及一般世人造成了如何的福利；第二、要替如此一位大師的社會經濟理論辯護，以解答若干疑難，並將其中一部分論點更充分的發揮；最後，還要把近代經濟學推究一下，把社會主義的性質考察一下，將目前這種社會混亂狀況的根原挖抉出來，

並指出那唯一有利的補救辦法，這補救辦法便是天主教道德的維新。上述即是本通諭所打算處理的三個論題。

勞工通諭所造成的福利

所以，我們就從前面提出的第一個論題說起，我們實不得不對全能的主表示謁誠的感謝，爲了良十三世的通諭所給我們帶來的福利。我們記得聖盎博羅削(St. Ambrose)曾這樣說過：「最迫切的責任莫過於感恩，」若要把這些利益用極簡略的方式數說一下，我們就得把過去四十年間的整個社會史都回憶起來。爲便利起見，我們可以把這些利益，按照我們的前任爲要現實他的偉大改造工作而提出的三種干涉方式，來分成三大類別，以便逐一說明。

教會做了什麼

第一、良十三世本人即已清楚的說明了教會能做些什麼事。「教會應以福音的權威來堅持這些教訓，遵照這些教訓，鬥爭就可以告一結束，或至少可以變得沒有那麼可怕。教會不僅可以努力照明人心，並且可用它的教條來指導一切人等的生活和行爲。教會又可以用各種組織來改善工人的生活。」

在理論方面

這種向上的偉大力量，教會並不是毫不利用的把它閹割一邊，卻時時從裏面汲取泉

源以培養爲大衆所渴求的和平。通諭「新事」所包含的社會經濟理論，不僅良十三世自己，同時還有他的繼承者們，都時常用口頭或書面的言語來重說，來加重；他的繼承者們並且還時時留意着，使它更能適應於常常在改變的時代環境，他們永不放鬆他們父親似的關切以及司牧的恆性，特別是在保衛窮人和弱者的事件方面。此外又有無數的公教司鐸，也都以同樣的熱忱和高見，能解釋並發揮這個理論，並且遵照了聖座的意旨和指示，來把它應用到各不同民族的特殊環境上去。

因此，這是毫不足怪的，在教會的訓誨和領導之下，有許多有學問的司鐸和信友，都竭誠的依照我們這時代的環境，來探討社會經濟科學的問題，其最主要目的，即在於把教會的永久不可變易的原理，適應到近代的需要上去。

這樣，一種真正的天主教的社會科學便在良十三世的通諭的指導和照明之下出現了。此外，我們又指定了許多出色人才來做教會的輔佐，他們的不知疲倦的辛勤，更一天使這新的社會科學愈加成熟，愈加豐富起來。他們又並不拿它當做一種高深學術似的隱藏着，卻使它儘可能的公開於一般生活，例如在各公教大學，研究院，及學會裏面，均設立了一些有價值的，受人注意的課程，各處地方又時時在舉行社會問題的討論會及週會，且均得到良好效果，各種研究團體也組織起來，各種內容健全的定期刊物又廣泛的散佈着。

那分通諭所造成的影響還不僅此而已。「新事」所包括含的理論，並且漸漸影響了那些站在公教統一教會之外，不承認教會權威的人們；這樣一來，公教的社會學原理，就成了全人類的知識遺產之一部分。更足以使我們感到欣幸的是，我們那位出色的前任所如此有力的宣布的公教真理，不僅那些非公教的書籍和刊物也來幫忙推進着，主張着，並且在立法會議和法庭中間，也時常被人家提出了。

不僅如此，在世界大戰之後，各重要國家的統治者們，均想把社會情況完全革新，籍以恢復和平，他們定下許多原則，來調整勞動者的正當權利，他們有許多結論都恰巧與良十三世所提出的原則和警告相符合，竟彷彿是從那裏面推演出來似的。「新事」通諭已成了一種最值得追念的文件，對於它，我們的確可以應用以撒意亞的這句話：「一個為各民族所通用的準則。」

在實際應用方面

同時，研究和討論又使教宗良的教訓成為舉世咸知的東西，於是就有人設法把它付諸實施。為了近代工業的發展，有一個階級的人在數量上大大的增加，但是它在社會上的合理地位卻沒有確定，因此便常常成為冷淡和輕鄙的對象；現在，卻有人懷着積極的慈善精神，用種種方法把這個階級的地位提高起來。

這個階級便是工人階級。所以在修會與不在修會的神職們，均在他們主教的指導之

下，在萬分繁重的其它職務之外，又積極的開始了民衆教育和文化的工作，使人們的靈魂受到莫大利益。

他們不斷的努力，把天主教精神灌輸到工人們的心靈裏去，這同時就能在他們身上喚醒一種真正的自尊感覺。使他們時時能清楚的看到他們所處地位的權利和義務，就能使他們獲得合法的真正的進步，因而成爲他們的同伴的領袖。

從那個時候起，生活的資料已供給得比從前更爲豐富，更爲安穩了。爲響應教宗的呼籲，各種慈善工作均在教會的領導之下開始增加起來。許多新的機關也在司鐸們的指揮之下產生出來，憑着這些機關，各階級的工人、工匠、農夫、及掙薪水的人，都可以互相的幫助和支持了。

民政當局做了些什麼

至於說到民政權力方面，良十三世又勇敢的超越了自由主義所加上的限制，大無畏的宣布了新的學說，主張民政權力不過是法律和秩序的保衛者，它必須盡熱忱的努力，務使「法律和制度，以及國家的一般性質和行政，均能自然而然的現實公共的福利和私人的繁榮。」不錯，個別的公民和家庭是應該有某種正當的自由行動權的，但必須要在公共福利獲得保障，不致有公道發生的條件之下，這個原則纔能夠成立。統治者的責任即在於保護社會及其各種組成分子；爲要保護個人的權利，他們首先應該對於弱者和

貧困者特別關心。『因為富有的階級有許多方法可以保護他們自己，不十分需要國家來幫助，但是勞苦大眾却並沒有自己的辦法可以倚仗，他們就須特別依賴國家的支援。爲了這個理由，掙工資的人既然多數屬於貧苦階級，政府就應該對他們特別的關心，特別的保護。』

我們當然並不否認，即在良十三世的通諭發表以前，也有若干統治者在供給工人階級之較迫切的要求，在防止對他們所施行的較厲害的不公道行動。但是，自從伯多祿的聖座向全世界大聲疾呼之後，各國的首領們乃更能充分的意識到他們的責任，並且鄭重的開始工作，實施起種種更爲廣泛的社會政策來。

的確，『新事』通諭已把自由主義的那些不穩當的理論完全推翻了，好久以來，政府之所以不能作有效的干涉，也正就是爲着這些自由主義的理論在那裏作梗。那通諭使人民自身也能夠更有力的，並且更正確的推進他們的社會政策，並使公教教友中間的優秀分子，能給予國家的統治者以莫大助力，在各種立法會議之中，他們往往總是這個新政策的積極擁護者。不僅如此，事實上的確也有不少關於社會問題的新法律，都是由受了良十三世的教訓之影響的教友首先提出，再付人民代表表決的，並且在法律成立之後，這些教友又謹慎的推動着，督促着，務使能見諸實行。

由於這種艱苦不絕的努力，便產生了一種以前所未有的新的法學門類，這種新法學